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张劲夫 罗波◎著



独龙江文化史纲：  
傣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

芫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张劲夫 罗波◎著

独龙江文化史纲：  
傣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

芫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龙江文化史纲: 傣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 罗波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芑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696 - 3

I. ①独… II. ①张… ②罗… III. ①独龙族—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77 号



出版人: 徐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廖泽恩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9.75 印张 37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52.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总 序

黄淑婷

青藏高原古称“羌野”<sup>①</sup>，“喜马拉雅”与“横断”两条山脉在东南交汇，形成北半球地表褶皱最明显而紧密的区域——纵横千里，层峦叠嶂，忽而峡谷幽深、激流汹涌，忽而悬崖突兀、雪峰傲立。雄奇的景观掩饰着严酷的自然。适宜耕种的土地集中在河谷，陡峭的高坡土层稀疏、岩石裸露、杂草丛生，经常发生泥石流。山川、植被、动物、村庄依季节交替呈现出各种姿态：旱季，尘土飞扬、风霜严寒、万物萧条；雨季，四野青翠、鸟语花香、人畜徜徉于云端。

羌野东南素有“民族摇篮”之称。在北纬25°~38°、东经90°~104°的广袤区域，由东至西，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雅鲁藏布江，史前时代的汉羌之争，造成部分羌人融为汉族，部分羌人西迁。<sup>②</sup>西迁的羌人一部分沿着江河古道北上甘青，另一部分南下川滇，到达今川、滇、藏交界区，更有一些部落进入了东南亚。他们南北行走的整套路线分布的区域到公元前4世纪业已形成民族走廊。《史记》记载了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特产的见闻<sup>③</sup>，那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两个世纪，最后一批迁徙者

---

① 《诗经·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羌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大意为周天子令诸侯征伐氐羌系部落，西行到青藏高原，将土思乡，无心恋战，企图班师回朝的情景。《说文解字》解“羌”，一为“远荒”；一为草本植物，如“秦羌”——兰花形，生长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海拔3000米的荒野，愈往西愈密。故“羌野”指今青藏高原东部，即今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相交界的区域。

② 如《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2~253册）有“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记载，说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群竞争的压力，由今甘陕地区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

③ 汉朝的四川特产远播大夏绝不可能走西域丝绸之路，那样将徒增路程，最有可能的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起点为成都，终点为印度甚至波斯（今伊朗），中间点为夜郎（今贵州）、滇（今昆明）、南诏（今大理）、缅甸。这说明中西交通很早就贯通了。

沿着民族走廊进入东南亚。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西迁，抵达青海湖与当地羌人杂处，出现西羌、吐谷浑、白兰、党项、附国、吐蕃、姜人等古代部族，也有南迁的情况出现。各民族部落在南迁路中定居、联姻、繁衍，发生贸易、战争和宗教行为，经过千百年的基因采借与文化交汇，演变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克钦）族、克伦族、骠族、缅族、掸族等境内外民族。<sup>①</sup>元明以降，封建国家的势力先后侵及这片土地。目前，一块归中国，一块归印度，一块归缅甸。《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就揭示了我国西南川、滇、藏和川、青、藏接壤地带极具内涵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是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人们的体质特征与三支种群有关：①蒙古北亚人，特征是高身材、中头型、高鼻型、前额平坦、黑眼珠，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身材颀长；②蒙古南亚人，特征是身材略矮、低头型、前额微窄、褐色眼珠、低鼻型；③“藏彝走廊”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又自成一类，其特征是中身材、中头型、中鼻型，孩子的眼珠较黑，成人的眼珠泛褐。具体来说，怒族和独龙族人带有蒙古南亚人的体质特征，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人带有“藏彝走廊”型的体质特征。由于藏族人的来源复杂，内部族群众多，有的体质特征偏向蒙古北亚人。例如，三岩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关系密切些，跟藏彝类型的藏族关系疏远些。<sup>②</sup>无论体质特征如何，这5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率真淳厚、健谈好客、谦让刚毅、吃苦耐劳的一面。人们因地制宜谋取生活资料，建造房屋，修建梯田，引水渡槽，高山放牧；人们也抽烟喝酒、唱歌跳舞，知足常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集中进行民族识别（1953—1956年）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调查（1956—1958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描述，当时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已出现社会分化：有的社会结构呈尖锥形，如藏族的农奴制、纳西族的土司制；有的社会结构呈钝锥形，如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怒族和独龙族。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是通过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独龙江两岸的村落出现了头人、大小巫师（南木萨、龙萨）、工匠、平民、家奴。前三种人基本上是富裕的族人，他们拥有土地，蓄养奴隶，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奴隶来自债务和买卖，成为家庭的一员，由主人安排婚姻，给予经济开支。奴隶在公共场合（如祭礼、

① 参见（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97列传第1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8～2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2上列传第147上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南蛮、西南蛮和骠国的描述。

② 参见何国强、杨晓芹、王玉等《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08～417页。

公议、公断等)与平民有身份界限。劳动过程中主仆地位不同,主人为奴隶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种子),并占有全部收获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各居其位,各层次的差别不大,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发生的共济、共庆、换工等集体行为维持着内部平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起到恐吓叛逆者、安抚民众、制止反抗的作用。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碎以后,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其所传承的文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17世纪,西方人陆续进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与横断山脉南部的多条河谷。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待这里的风土人情。19世纪伊始,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行政人员、桥梁工程师开始进入这片地域上无人知晓、地图上一片空白的沃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50年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材料。英国、美国、印度三国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如果只见他们为殖民政府服务的一面而不见其科学记述的一面是不公平的。在此,我愿意借鉴沙钦·罗伊的书单<sup>①</sup>,肯定J. 马肯齐、J. 布特勒、G. W. 贝雷斯福德、A. F. 查特尔、P. C. 巴利、B. C. 戈海尔、M. D. 普格<sup>②</sup>等人的工作;我还要提到F. M. 贝利、F. K. 沃德、维雷尔·埃尔温、P. N. S. 古塔、马骏达、N. 罗伊、B. C. 古哈和S. 罗伊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约瑟夫·洛克、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和埃得蒙·利奇的奉献。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西南边陲,在川、青、甘、滇接壤地带考察,为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协会和哈佛大学收集植物和飞禽标本,在丽江度过了2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的研究兴趣转移到纳西族的文化上。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收入了东巴教及濒于消亡的古纳西语,他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叙述了当时甘青交界处、滇西北、川西南和西藏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物产和文化。1992年,迈克尔·阿里斯在纽约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强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了洛克在川、滇、藏的田野研究经历。<sup>③</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奇在克钦山区打游击。那个地区为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三面环绕,有号称“野人山”的莽莽丛林。利奇广泛地接

<sup>①</sup> 参见(印)沙钦·罗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李坚尚、丛晓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02页。

<sup>②</sup>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孟加拉北极边地区山区部落记事》(1836年版)、《阿萨姆山区部落概述》(1847年伦敦版)、《阿萨姆东北边境记》(1881年西隆版、1906年重印)、《阿波尔的吊桥》(载《皇家工程师》1912年第16卷)、《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载《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929年总字第25卷)、《阿波尔人的农业组织》(载《人类学系调查报告》1954年第3卷第2册)、《东北边境特区的娱乐活动》(1958年版)等,这里仅仅提到很少的一部分。

<sup>③</sup> 参见Michael Aris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触克钦人，于1954年出版《上缅甸诸政治体系》，提出社会转变的动力学模型。几乎在同一时期，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在印度调查了10年，期间以特派员的身份在阿萨姆地区工作两年。他和妻子贝蒂·勃纳多在调查阿帕塔尼人<sup>①</sup>的间隙中，专程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斯皮峡谷，那里距离西藏的瓦弄咫尺之遥。因物资供应不足，1944年4月2日夫妇俩开始撤退，准备翌年再进行调查，后因印度政府决定推迟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进入西藏察隅地区。海门道夫基于田野调查的12本书<sup>②</sup>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家，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利用前人收集的原始资料、绘制的地图、提炼的概念、阐述的命题和他们的民族识别、文化分类的成果，并汲取他们务实与求真的精神力量。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调查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左仁极、羊泽、朱刚夫、李式金、李中定、陶云逵、黄举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曾赴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调查成果虽然一鳞半爪，但科学精神不可低估。李霖灿、方国瑜、杨仲鸿对纳西语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同仁，如王辅仁、王晓义、孙宏开、刘龙初、刘芳贤、宋恩常、宋兆麟、吴从众、李坚尚、杨毓襄、张江华、姚兆麟、龚佩华、谭克让、蔡家骥、欧阳觉亚（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跋涉于川、青、滇、藏交界区的山水之间，也提出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sup>③</sup>197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迁至拉萨，组织翻译了一批文献，吴泽霖、费孝通都身体力行地做过译介工作。<sup>④</sup>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田野研究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理论方法上也有故步自封的表现，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素材，而较容易忽视社会组织、风俗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素材。

① 中国民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帕塔尼人与珞巴族人同源，阿帕塔尼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珞巴族包含20多个部落，如尼升、巴依、玛雅、纳、崩尼等，其经济形态与独龙族完全相同。

② 它们是《赤裸的那加人：阿萨姆邦的猎头部落的战争与和平》（1939年第1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苏班西尼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年版）、《喜马拉雅山区未开化的民族》（1955年版）、《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1962年版，有中译本）、《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信佛的高地居民》（1964年版）、《尼泊尔、印度和锡兰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对印度教与佛教相接触地区的人类学研究》（1966年版）、《尼泊尔人类学述略》（1974年版）、《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尼泊尔高地的生活》（1975年版，前三章半有中译本）、《喜马拉雅山地部落：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1980年版）、《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年版）、《西藏文明的复兴》（1990年版）和《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1990年版中译本）。

③ 参见林耀华《序》，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费孝通译文集·前言》（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强调“补课”，出版了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著述，这是可喜可贺的。最近十几年，获得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欠缺实地调查的经历，学界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放松，对边陲少数民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市面上田野研究的著述稀少。有人说，目前田野工作的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可如今的实地调查与书斋研究的比例较之于过去不知减少了多少。<sup>①</sup>本人深有同感。我虽然退休多年，但也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现在科研的资助力度每年都在增大，下达的课题也在增多，出版界欣欣向荣，民族类的期刊、书籍相当多；但是，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跟上来。由于辛勤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认真提炼、精巧构思并以朴实平正的笔调叙述的作品不太为社会所赏识和鼓励，因此田野作品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与历史的发展很不合拍。就青藏高原东南部而言，随着旅游的开发，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被带动起来了，国内外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民族现状，抢救、整理和保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迫在眉睫。但经常到农牧区做调查的人不多。原因何在？这恐怕与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有关。譬如，有些环境陌生而艰苦，原创性作品生产周期长，即使出得来，社会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如“跟风”成效快。“不可否认，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评判成果室内室外一刀切的做法，都是使田野调查边缘化的原因。”<sup>②</sup>我认为，端正调查之风、调整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否则民族学研究将难以为继，更谈不上以良好的姿态服务于社会。

西北川、青、藏交界区，以及西南边陲川、滇、藏接壤地区，民族学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以何国强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不畏艰苦、锲而不舍地调研。这套由7部专著组成的丛书即有选择性地介绍了那里的民族文化。分册和作者名依次为《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许韶明）、《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李亚锋）、《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许韶明、坚赞才旦）、《独龙江文化史纲：傈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罗波）、《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妇女何在？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翻开细细品

<sup>①</sup> 参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sup>②</sup>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序言》，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等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味，看得出作者们长期研究的积累。主编何国强教授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组织者。他 17 年来坚持探索汉藏区域文化，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调查素材、史志和理论三点互补，中外资料融会贯通，以及汉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现象互为衬托的研究思路。自 1996 年夏天至今，他已 11 次踏上青藏高原。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他努力寻求基金会的支持<sup>①</sup>，推动每一届研究生到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选题作论文，秉承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西南民族的传统，深入偏远的高山峡谷。据我所知，另外 10 位中青年作者在跟随他学习期间，除极少数人之外，皆有 1 年左右的调查经历，目前分别在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他们的成果与书斋式的研究不同，每一本书都充满鲜活的材料，讲理论、重实际，穿插纵横（时空）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类型）比较，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调查员根据已有的知识草拟提纲，到当地观察、询问和感受，苦学语言，一丝不苟地记录，孜孜不倦地追寻文化变迁的足迹，修正调查提纲和理论预设。他们入乡随俗、遵循当地礼节，与村民建立互信，由此获得可信的感知材料。但这套丛书不是田野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在科学方法和理论模块引导下的分析、综合与描述，不仅揭示了该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风俗制度的动力和机制、传统生计的命运、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角色变迁等——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解答。

这套丛书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偏远之地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多维视角，突出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同时给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民族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抢救和整理濒临绝境的原生态文化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在增进国民福祉及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在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并带动民族文化的保护性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套丛书还凸显了“好料做好菜”的诀窍。前期 4 个课题资助，10 余年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认的产品，需要紧扣“民族特色”提炼选题，科学搭配，形成整体效应。编者先是将婚姻与丧葬制度、血缘组织、传统生计、本地宗教和外来宗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碰撞、妇女地位、先进民族的帮助与后进民族的发展等选题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共同反映特定区域的文化，“好菜”就做了一半；继而在中山大学

<sup>①</sup> 本研究相关课题获得 4 次资助，即“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研究：以卫藏和康的五个社区为例”（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2004—2005 年）、“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6—2008 年）、“三江并流峡谷的民族文化和结构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2009 年）、“川青藏藏交界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2014 年）。

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争取新的资源来整合后续工作。这样，整道“菜”就做好了。以上两点在何国强教授与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中可见端倪，同时专家的支持<sup>①</sup>也相当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各分册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保持良好的互动，认真审稿，精益求精地修改文本、补充资料、优化结构，本着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凡此皆说明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对于完成科研成果转换的重要作用。

---

<sup>①</sup> 这套丛书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两次申报工作，均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的极力推荐。

# 目 录

|                                  |     |
|----------------------------------|-----|
| 导论 独龙族生存的动力模式/1                  |     |
| 第一节 峡谷中的独龙族·····                 | 1   |
| 第二节 生存的动力学：一个可操作的研究模式···         | 19  |
| 第三节 田野工作与资料来源·····               | 33  |
| <br>                             |     |
| 第一章 食物的生产及技能的调适/41               |     |
| 第一节 食物的供给与技能习得·····              | 41  |
| 第二节 以政府为主导的技能培训·····             | 63  |
| 第三节 技术改良与发展干预·····               | 77  |
| <br>                             |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秩序：亲属与村落组合的原则/84         |     |
| 第一节 亲属分类法则·····                  | 84  |
| 第二节 克恩：土地与血亲组合的村落·····           | 100 |
| 第三节 领土权与村落边界的流变·····             | 115 |
| <br>                             |     |
| 第三章 交换与分享：获取资源的途径/127            |     |
| 第一节 交换的类型和特点·····                | 127 |
| 第二节 内部交换系统与远距离贸易·····            | 139 |
| 第三节 稀缺与分享：交换的社会动力学·····          | 154 |
| <br>                             |     |
| 第四章 信仰与仪式：村落社会整合的宗教因素/158        |     |
| 第一节 神灵信仰中的互惠性、禁忌及其实践·····        | 158 |
| 第二节 基督教精英的角色及教堂活动·····           | 175 |
| 第三节 适应的困境：信仰的理由在哪·····           | 186 |
| 第四节 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整合：观念、实践与调适<br>····· | 192 |

|                                 |     |
|---------------------------------|-----|
| <b>第五章 精英的角色：内外沟通的行动者/197</b>   |     |
| 第一节 家族长、祭司和头人：擅长沟通的地方精英·····    | 197 |
| 第二节 作为国家与地方的中介：地方精英的行动·····     | 206 |
| 第三节 村干部的生存角色·····               | 216 |
| <b>第六章 边缘政治：从多边关系到一体化进程/229</b> |     |
| 第一节 边疆社会的族群与政治·····             | 229 |
| 第二节 夹缝中的生存政治·····               | 250 |
| 第三节 民族国家进程中所依赖的生存条件·····        | 260 |
| <b>结论 互动、交换与适应产生的动力学诠释/273</b>  |     |
| <b>附录/283</b>                   |     |
| 附录1 独龙江迪政当新生代的生存经历·····         | 283 |
| 附录2 独龙江乡技能培训计划（2012—2013年）····· | 288 |
| <b>参考文献/290</b>                 |     |
| <b>后 记/300</b>                  |     |

# 导论 独龙族生存的动力模式

俅江在喜马拉雅山东面的南麓，这条大山之阳，乃印、藏、滇、缅的交接地带。印度的血种本是很复杂的，西藏也并不是很单纯。滇缅边缘地，是蒙古种中较初民族的逃蔽地。这一带的居民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非常复杂，问题极多，从而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俅江一个月，只能了解俅子族<sup>①</sup>的概况。但是，这地方非常值得研究，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

——陶云逵《俅江纪程》

## 第一节 峡谷中的独龙族

峡谷、河流构成了滇西北各族生存的生态空间，而滇西北中缅交界地带独龙江和独龙族的历史过程很好地诠释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意义。独龙江旧称“俅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余脉舒伯拉岭东麓，两支源流从西藏察隅县境内流下，其中一支源流称为日东河，流入云南境内称为克劳洛，与另一条位于东部的支流麻必洛相汇于斯仁，始称独龙江。至此，从北向南的深谷不断有涧流从两岸山谷中流入，经过钦兰当出国境与南塔迈河汇合后称恩梅开江，再经依洛瓦底江流入印度洋。独龙江在我国境内总长 178.6 公里，总流域面积 4 327 平方公里。<sup>②</sup> 大小村落分布在独龙江两岸——独龙族人称之为“当”的平缓地带，一个“当”字所在的村落，即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大村子。克劳洛和麻必洛不仅是独龙江的源头，也是独龙族的发源地之一。奔腾的江水，滋养了茂密的森林和野生动物，为独龙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态

<sup>①</sup> 俅江、俅子族分别为独龙江和独龙族的旧称。

<sup>②</sup> 参见李恒编著《独龙江地区植物·前言》，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3 年版。

环境。

## 一、边界与历史：独龙族人生存空间形成的过程

独龙江作为地理区域概念，属于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四江（另三江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与缅甸毗邻，北靠西藏察隅县，处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独龙江深切于群山之中，与东西两岸的高黎贡山北段和担当力卡山共同构成了区域地貌的基本骨架——地势北高南低，向西南开口，朝向印度洋孟加拉湾。两山夹江对峙，南北绵亘，海拔多在3500米以上。其最高山峰滴舍尔腊卡（察隅境内克劳洛北面）海拔为5242米，第二高峰贡山县境内独龙江乡和丙中洛乡交界处的嘎瓦嘎普峰海拔为5128米，这是独龙族和怒族共同的神山；至南部出国境的江面海拔降至1160米，相对高差3000~4000米，属于起伏极大的高山峡谷地貌类型。独龙江上游段（雪扒腊卡以北）具有高原面上的宽谷特征，孕育了比较平坦的河谷盆地，如雄当、迪政当。中下游河谷（巴坡以下）狭窄，谷坡陡峻，阶地不发育，河水湍急，多险滩，水面宽仅20~30米；马库至钦兰当一带嶂谷多，山川紧逼，形成天堑，仍覆盖着原始森林。独龙江流域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但受高山峡谷地貌的影响，气候垂直分布带谱十分明显：沿江地带（海拔1200~1800米）为湿热河谷区，年平均气温14.8℃；从江边至山顶，随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48℃。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坡，每年有半年以上的积雪，对外交通因此而受阻，到目前为止，一年有6个月封山。由于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充沛，每年降雨量为2900~3000毫米，下游地区年平均降雨量接近4000毫米，是云南省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sup>①</sup>

山高谷深、天无三日晴的地理气候特点以及半年的积雪封山限制了峡谷内居民与外界的交往，因而给世人一种刻板印象——在此峡谷中生活着一群彼此封闭、与世隔绝的独龙族。然而，地方文献清楚地记载着峡谷中的人民为了生存而与邻族进行物资交换，而且随着生活物资的流动，外来的文明、政治力量也被带进了峡谷。地理因素并没有妨碍独龙族人与外界交往，也未能阻挡来自相邻地方势力的入侵，只是相较而言延缓了独龙人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

### （一）明代以前的历史考证

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卷二“大雪山”条曰：“大賧，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又卷六“永昌城”条曰：“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方国瑜

<sup>①</sup> 参见尹绍亭著《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李恒编著《独龙江地区植物·前言》，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

据此认为该地北接吐蕃，西抵天竺，是木王地坎底城，南诏阁罗凤所开西北重镇。<sup>①</sup> 其位于今天恩梅开江河畔，缅甸联邦克钦人控制区域的坎底平原，又称葡萄县，是清末边地官员夏瑚巡视俅夷地时的终点站。由此，学界普遍认为，独龙江流域最早纳入地方政权的管辖始于唐代，但唐朝时期地方资料有限，无法佐证，坎底及独龙江流域独龙人是否属于南诏管辖还未能明证。

唐初，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地区各部落并建立吐蕃王朝。他所控制的势力范围东至青海和四川西部，东南至迪庆高原。吐蕃地方政权为了稳固滇茶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同时为了保障出兵四川右翼的安全想要控制洱海地区，这使得迪庆高原成为唐朝与六诏角逐的基地。<sup>②</sup> 为此，吐蕃王朝在铁桥镇设置了神川都督。根据唐代樊绰《蛮书》记载，神川治地铁桥指今天丽江市塔城，辖区包括今丽江、维西及剑川以北地区。又据《蛮书》卷二：“往往有吐蕃至賧贸易”，“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三口将来贸易”。西羌是指川青地区，铁桥指今塔城地区。由此可见，包括今迪庆所属中甸、维西、德钦各县当时俱为吐蕃地域。937年大理王国崛起，滇西地理建制承袭南诏的设置，设剑川节度治理与吐蕃接界的北域。随着吐蕃政权的衰落，大理趁势将吐蕃遗部驱逐，“以白人居之，立义督賧”（《混一方域胜览》“鹤庆路”条），废剑川节度，隶于谋统府。<sup>③</sup> 同时，在东北部设立善巨郡（今永胜地），后改为成纪镇，治所仍在善巨，并辖及旧日南诏从吐蕃夺得的铁桥地。据《元史·地理志》“临西”条称：临西“乃大理极边险僻之地，夷名罗哀间，居民皆摩、些二种蛮……”，元时维西称临西。从这段记录来看，大理政权并没有控制维西地域及其西北之地，那么对隔着怒江峡谷和高黎贡山的极西之地独龙江流域更加无法顾及。元朝统一了西藏地区，采取“因其俗而柔其民”的治理政策，大力起用地方大族或上层掌握当地政权，在卫藏地区扶持萨迦派，僧俗并用，以维护中央政府的统治利益；在原来吐蕃王朝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sup>④</sup>，德钦、中甸的上四境及维西西北部地域俱为其管辖之地；其余滇西北大部分地区处于丽江路管辖。

方国瑜考证《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记载的八蛮<sup>⑤</sup>之一“撬”为俅江之居民，今独龙族先祖；又据八蛮的居住分布来推断丽江路辖地西界至怒江

<sup>①</sup> 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6页。

<sup>②</sup> 参见王恒杰著《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sup>③</sup> 参见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0～661页。

<sup>④</sup> 参见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sup>⑤</sup> 《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

以西的傣江。<sup>①</sup>

但是，以上所记载资料无法说明今天的贡山县所在的独龙江流域的地理历史情况，直到明清时期滇西麽些<sup>②</sup>木氏土司的兴衰引起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官方文献中的记录增加，怒江西北的情况才逐渐明朗。与此同时，滇西北地方族群的历史遭遇和维西土司的命运，以及木氏土司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军事角逐纠缠在一起。

## （二）傣江的开拓

明朝承袭元代的设置，维西仍被称为临西，处于滇藏势力的交界。万历《云南通志》卷四“丽江府”条记载：“明仍为临西县，正统二年被吐蕃占夺，仅存一寨，后被革除。”明初，藏族地方武装常侵扰滇西北，而明朝军队路途遥远难以顾及，于是明朝中央政府扶持地方大族丽江木氏来牵制之，封木氏为千夫长“守巨津州石关，与西番接境”<sup>③</sup>。此后，木氏土司势力迅速增强，先征服了迪庆藏族聚居区，渐而控制川藏交界处的木里、巴塘、理塘、盐井各地，成为滇西北的一方豪强。

明末清初，木氏土司的势力受到了打压，其军队亦退出了藏族聚居区；随着清朝政府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后，大清帝国开始全国大一统的进程，清军进入云南，而后采取“改土归流”，滇西逐步纳入中央政治体系中。同时，清朝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不希望木氏土司与藏族武装有军事上的冲突，木氏的势力由此衰落。但在极边远之地，土司的权威尚在，由于语言、习俗的影响，相比流官，地方族群更信赖原来的土司。中央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并没有完全取消土司的权力，而是委派他们担任土守备、土千总等职位，与流官共同治理地方社会。此后，在滇西北及滇藏边缘地带，西藏喇嘛寺与云南土司、地方政府争夺某一区域的人口、税收管辖权发生冲突、合作与联盟等多重地缘政治关系。维西土司禾娘及其家族与察瓦龙领主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禾娘原属于丽江木氏的一个家庭分支，被任命为“木瓜”<sup>④</sup>驻守维西地区，她与儿媳妇禾志明——也是一位非常勇敢忠心的女将，共同开辟维西及其西北的怒傣一带。她们在上帕（今怒江州福贡地区）任命熟悉傣江之地且能干的怒人为傣管，到傣江替她们征收门户送解，每年一次，其子孙世代相沿，

① 参见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6页。

② 历史上，麽些又称么些、摩些、磨些、末些。

③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〇七）。

④ “木瓜”为纳西语，“木”为兵的意思，“瓜”为管理者之意，“木瓜”意为“兵的管理者”，是丽江土司之下的最高官员。



及至清末。<sup>①</sup> 雍正五年（1727年），随着丽江木氏土司的日渐衰落及其改土归流，禾娘、禾志明主动归附朝廷，受委于清云南地方政府，禾娘仍被授为土千总。维西建厅设流官后，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归丽江府管辖。与此同时，独龙江流域和怒江上半段怒俅子民先后归附于维西土司。禾娘通过设俅管“伙头”、“百色”（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甲长和保长）来管理村寨事务，收缴土司岁贡。<sup>②</sup> 因此，俅江地区在明中后期受纳西族土司的管辖，最后与维西土司一起并入大清王朝的版图。

纳西族人（麽些）禾娘、禾志明婆媳两人在驻守维西时，凭借其勇猛，北抵西藏察瓦龙喇嘛寺的武装，西拓怒俅之地；但是，她们自己也遭受了创伤，禾娘的丈夫和儿子皆发病身亡，从而直接影响并削弱了纳西族土司在西藏交界地带的统治力。根据当地居民的口述<sup>③</sup>，怒江上半部和独龙江原是维西土司辖地，因其儿子生病，禾娘（贡山当地人称阿日甲姆）请西藏喇嘛来作法治病，如治好其子的病，禾娘许诺送怒江上半部和独龙江为其“香火钱粮”——每年喇嘛可派人去其地收税。后来，禾娘儿子的病并没有治好，但慑服于喇嘛强大的法力，只能忍痛送给他们两江上段的收税权。在清代文献的记载和地方志表述中则没有提到禾娘及其丈夫和儿子病亡的情况，而是记录了禾娘的后人即维西土司的继任者王国相（第八个继任者）“丢掉”独龙江和怒江上半部的统治权。例如，乾隆年间云贵总督硕色奏折《伴送遣回俅夷》提到维西叶枝土司第八代统治者王国相将俅江划分为上下两端进行统治，上端完全划归察瓦龙土司和喇嘛寺管理<sup>④</sup>；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编撰的《菖蒲桶志》中记载：“时于光绪年末叶，王土司信佛，将管辖区钱粮送与藏属察瓦龙喇嘛作香火资。”<sup>⑤</sup> 上述记录无法说明察瓦龙喇嘛寺和领主如何取得独龙江和怒江上半部的统治权，但已经表明了两江早在清代被划入察瓦龙藏族人税收范围。《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记载：“菖属喇嘛教，系为红教。……其管理寺者，系喇嘛管事夷人，小喇嘛四人，掌教者系维西叶枝禾姓大喇嘛，现在维西寿国寺代务，建寺原因，纯系土司主义。”<sup>⑥</sup> 又如清末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

① 参见《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铃印抄本，时任上帕（福贡）设治局长是保维德（云南陆良人），此抄本现藏福贡县图书馆]，见怒江州志办公室编《怒江旧志》，1998年。

② 参见李道生《维西康普、叶枝等土司管理怒江始末》，见李道生主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政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刊印，第50页。

③ 参见云南省编辑组编《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④ 参见硕色《伴送遣回俅夷》，见《怒江简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20～22页。

⑤ 菖蒲桶行政委员公署编撰：《菖蒲桶志》，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

⑥ 《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见怒江州志办公室编《怒江旧志》，1998年刊印，第141页。